

# 现代性历史境遇下儒学理论发展的策略抉择

孙晓喜<sup>1</sup>, 吕洋<sup>2</sup>

(1. 西安石油大学 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5;  
2.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在现代性这一历史境遇下,中国工业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儒学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现代新儒家无法回避的时代重担,以中西文化对话关系为视野的现代新儒学只有避免西方现代化的通病,才能重建儒学现代形态的形上之学。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新儒学;后形而上学;理性精神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090-05

当中国传统文化还处于向现代转型之中时,西方文化的发展转而又达到了一种“后现代状况”;在现代新儒家正忙于清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儒家文化之内容、体系、功能等障碍之时,却迎头赶上了“主体死亡”的世界性文化历史潮流,传统儒学的发展于是陷入了一个双重的窘境之中,传统儒学究竟应当如何发展,这无疑成为时下新儒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一、现代性双重境遇下 新儒学的发展契机

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化进程并不只是在现代社会才开始发生,就西方社会而言,早在基督教神学文化流行之时,基督教神学文化就曾大规模地提升西方人的世界历史观念;然而在现代条件下,新的世界历史化进程在现代性观念下再次现身,这一发源于西方的现代观念不可避免地依其本身的界定而自居为“中心”,并对“中心”之外的“他者”似有抹除之

意,对民族性、地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成殖民之势。对于当下中国文化的发展情况而言,儒学的发展正处于这一威胁之下而陷入无从选择的困惑之中。

在儒学文化的现代发展问题上,理解与认识现代性的历史与其本质是一个关键前提。分析西方社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现代性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环境下发生的“事件”,并随之在成长的过程中生成了一种似乎具有普适能力的示范性,它的示范性作用囊括了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的底蕴和特质显现于它对于“主体性”的崇尚以及其所诉诸的方式。“主体性”本身内涵客体的维度和主体的维度,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之初,西方学者在“科技以人为本”的名义下,借助技术理性对外在世界的征服效果印证了他们对“主体性”理想的崇尚;然而由于技术理性的扩张,作为“主体性”解放标志的个体空间却与其解放的原动力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而缓解这一紧张关系的手段之一本应该是针对技术理性的反思。但是,在现代性思维惯性下却造成主体本身的肢解,甚至“主体”被

收稿日期:2015-03-08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J061)

作者简介:孙晓喜(1975-),男,江苏新沂人,讲师,哲学博士。

宣布死亡。如福柯所言,主体只不过是一种现代的发明,而且可能是一种即将走向尽头的发明,在主体的终结之刻,就像抹去“画在海边沙滩上的脸”<sup>[1]</sup>。在现代性这样一个未竟事业的途中又逢上“现代之后”的状况。

后现代主义的突出表现为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相区别的“差异性”<sup>[2]</sup>。西方人自启蒙运动以来,以推崇理性、向往科学、追求社会进步为标尺,这一全新方式被视为是现代思想的表达;而后现代主义相对于现代主义的“差异性”,突出表现为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之崩溃为特征,按照大卫·雷·格里芬的理解,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等等,都是现代性的内容;与此相左,后现代主义表现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它昭示着一种批评的态度,它力图彻底扫荡现代主义中陈旧的形而上学观念,彻底肃清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构、中心与边缘、形式与内容的界线,从而达到消解传统视界内高雅与通俗、历史与故事、哲学与文学、科学与艺术等诸多对立的目的。后现代主义因而获得了内容上的反科学、反艺术、反历史、反道德的标签,也获得了思维模式上的反传统、反体系、反形而上学的标签。

从“人是万物的尺度”<sup>[3]</sup>的古典理论发展到“人的死亡”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西方思想在思维逻辑内发生了革命性的逆转,在现代性本身所衍生出的这些新观念使世界历史被直接抛入了一种“后现代状况”。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预料的,成为现代的过程之于人的历史而言乃是主体的发现与失落的巨大漩涡,它使我们拥有一切之时又痛失一切,以擢升主体为初衷的现代化最终却以主体为革命的对象。

在这一宏大的时代历史观念下,这种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潮流与一种还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发生激烈的冲突。对于当下中国传统儒学的发展而言,西方人所塑造的现代观念的流行化趋势增加了文化殖民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当代新儒家几乎无一不意识到,儒学文化生态的未来发展无法绕过现代性这一境遇,儒学发展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对于现实来说,那就是如何在现代与后现代双重境遇下拓新儒学理论空间,以解决诸如文化发展中的理论设计与现实基础的切合、科学性与人文性之平衡、世界性与民族性之关系等问题。

## 二、现代新儒学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审查

法国现代学者安托瓦纳曾经把现代性的特质概括为一系列的悖论,并似乎绝望地断定,现代之路是一条不断背叛自身初衷的里程,犹如从一个死胡同走向另一个死胡同。因而,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很显然可以发现,现代性不仅仅只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现代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只是西方世界率先遭遇了它,并且至今仍无法脱身其中。所以,现代性就成为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根本特征。随着世界历史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地域、国家、民族甚至文化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的典型印象,现代性的演化过程在社会文化系统内表现为传统思想在失去其现实基础后的寻根之路,这一过程同时涵盖了现代社会内部的诸多矛盾,如对传统的态度、对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取舍、对民族性与世界性之关系的权衡等问题。

中国文化的百年发展无疑成为现代性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以儒学发展为主流的传统文化走向式微,进而在掌握话语权的西方文化的渐进中几乎被矮化为一种“中心”之外的异域文化,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不时使人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怀疑。然而,在透视西方文化的发展逻辑后不难发现,古希腊以来的传统逻辑在经过现代性的发酵之后,其倡导的初衷却与其逻辑发展的结果南辕北辙,西方人倡导的启蒙精神最后带来的却是人与历史的同时“终结”,这不能不让人倍感不安。在这一意义上进一步对比中西文化发展的逻辑,我们似乎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在走向现代的历程中,西方文化在追求严肃的科学性逻辑中损毁了自身;与此相对,中国儒学恰是因为其现有体系无力改造与容纳科学性的内容而逐渐失去吸引力的,它似乎不曾发生过那种西方式的毁灭。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要完成自己的发展使命,必须机智地去思考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问题,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类似这些理论关系的改造拓新之上,“传统的”才能合理地成为“现代的”。

近代以来,尽管儒学理论已经进行了百余年的反思和求解,但我们至今还处于这一过程之内。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儒学的结构性坍塌是从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迅速瓦解开始的。首先是

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打破了传统儒家文化在心理上的优越性,进而皇权的猝然引退又使传统儒家文化更是失去了一部分政治基础。在这个不断变换的历史境遇下,对社会发展敏感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忧虑,中西文化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纯粹性的理想与多样性的现实差距、科学标准与价值尺度的矛盾等等问题无不成为其思考的中心,这一思想求索的过程也成为现代新儒家之自我转化的过程。

在这一求解的过程中诞生的现代新儒学已经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与跃迁,其共同之处在于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与生命性,坚持传统的儒学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对于医治现代性症候的价值,对发展儒学以救赎“无根”的现代人寄以热切的希望。因而,现代新儒学鲜明地肯定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本位性,强调“心性之学”是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但与古典儒学不同的是,现代新儒学不再是以农业社会和皇权政治为背景,而是以率先被西方所制造出的现代性为背景。深受西方现代文化浪潮席卷之势的影响,尤其是与西方社会的发展状况相比,中国社会整体上陷入了物质生产效率、社会政治制度、精神信仰理念等多领域的溃败,这使得现代新儒学认识到“西学为用”的必要性,也意识到现代性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走向;但同时,现代新儒家也意识到,即使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视角来考量,现代性本身就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所以,现代性视域下的新儒学也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思想形态。

在新儒学拓新的进程中,对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构成其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现代新儒学在洞穿西方文化的发展逻辑之后,透彻地意识到“西学”可以“为用”,但不可为“体”,而恰恰是中国传统儒学能够承载现代性问题下的失落之“体”。因而,新儒学着力分析批判“西学”之“体”的失落,此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而最为核心的一方面就是人生意义的颠覆,“崇高不再”,亦即西方人话语方式中的“存在的虚无化”<sup>[4]</sup>,人生不再具有轰轰烈烈的意义。这不仅是中国儒学所不能接受的,西方文化也不期望遭遇到这样无奈的结果。我们知道,自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化以“启蒙”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占据了西方文化的中心位置,然而“启蒙”的逻辑结果却是其初衷的反面,人与历史同时走向“终结”的结果让人倍感怅然。

新儒学对现代性的悖论有着清楚的认识,以康

德的“三大批判”为标志,西方文化“认识论”情结催化了西方人的“科学主义”论,继之以“工具理性”代替了“实践—交往理性”<sup>[5]</sup>,从而继续造成对“崇高”的进一步威胁,使“生活世界”技术化、工具化。现实的生活顷刻间化为可诉诸于线性法则的纯粹物质化存在,过去与未来同时空场,历史失去了时间的纬度而被平面化,空间中所容纳的却只有物质的碎片。

新儒学明确意识到西方文化所诉诸的逻辑本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践行这一逻辑的结果是现代社

会种种危机的根源,尽管一次次工业革命带来史无前例的物质性繁荣,但人本身却从他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中剥离出来,进而又被物质化、符号化,如此一来,人不仅走到自然反面,也走到人自身的反面。鉴于这一批判的视角,新儒学在总体文化精神上对西方的现代性表明了其质疑的态度:“西方名数之学虽昌大,而其见道不真。民族国家虽早日成立,而文化背景不实。……近代精神,乃步步下降,日趋堕落。……然有坚强之形下成就,而无真实之文化背景者,虽曰日益飞扬,实则日趋自毁耳。”<sup>[6]</sup>

### 三、儒学体系与内容之现代化转换的可能性

新儒学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审查结果表明,西方人所选择的发展逻辑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新儒学并没有排斥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不仅如此,新儒学在通过对大历史的观察中肯定了现代性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课题。并且,率先接触现代性问题的西方工业化社会还可以为我们当下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提供前车之鉴。

在此形势下思考并设计新儒学未来发展的路径,不仅要求我们要保持对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也要求我们以一种跨文化的视界把中国传统儒学的发展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来考查。因而,发展拓新的新儒学明确地提出了学习西方之长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突出表现为现代新儒学对西方社会科学文化,尤其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青睐,因而新儒学强调向西方学习、吸纳以科学民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之长,在这一点上,新儒家一般都能够能够在“西学为用”的基本观点上达成共识,但在西方文化的甄别、吸收问题上,却存在着异域文化的本土适应性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另外,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跨文化发展方

面,又存在着“何以为用”的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是新儒学拓新道路上的障碍,我们从现代新儒学在接受“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态度上可窥一斑。

在文化现代化这一世界历史背景下,新儒家接受了此类现代性问题的挑战,并由此提出了“内圣开出新外王”新主张,期望从“仁心”之内推演出现代社会所流行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并从“良知本体”演绎出适合现代人的人文主义精神,为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在现代中国文化中确立内在的根据。现代新儒学还试图在传统文化核心的范围内探求打通“知性”与“德性”亘古以来的壁垒,以避免“德性之后”的无政府状况。

与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相联系,现代新儒学在理论拓新中明确表明自身的理论定位:立足于传统儒学思想的成就和文化根基,在接受现代性问题作为世界历史过程内的必然命题下,寻求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文化并独具中国地域特色的现代文化何以可能。以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勱、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主要是从传统儒学的角度指出了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关键与实质,初步论证了东西文化在现代情境下互通有无的可能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以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为代表的新儒家所创建的现代新儒学,对超越现代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有着更为清晰的论证方向,这一批新儒家清楚地自觉到“现代的偏向”是必须加以扭转的。

鉴于现代新儒家对现代性问题的自觉,现代新儒学的理论拓新也就自然围绕这些理论问题而展开,现代新儒学通过其一系列的学术理论阐明了其核心精神与基本立场。新儒家首先把“生存存在论”作为其整个理论的基点。脱离现实生存状态的任何形而上学是无法适应当今现代社会状况的,因而,现代新儒学的任何理论须臾不能脱离现代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它应该是作为“生命的学问”、“生活的学问”现身于形而上学的领地而不应该是“纯粹的”那一种,为现实关系中处于“烦”、“畏”、“死”<sup>[7]</sup>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价值尺度与存在意义之本体性功能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点上,现代新儒学摒弃了西方学者立足于技术理性之手段上的价值取向,把如何安顿生活态度、生命意义作为其理论趣味和核心指向,崇尚逻辑的技术理性至多只能归依到“知性”的领地而最终须在“德性”的领地中圆满,如“良知自我坎陷”之说,“知性”主体与“德性”主体并非天然统合,而统合的前提之一就是克服技术理性对存在意义“合乎逻辑”的蔑视。

因而,现代新儒学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在“生存存在论”的高度上以生活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性来纠偏无孔不入于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开创以认知世界主客体合一、生活世界人与自然合一为理念的超越纯粹知识论形态的现代认识论。为此,现代新儒学拒绝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一些广为流传的概念,因为在其看来,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文化生成体,沿用西方文化的现场概念就势必僵化另一种异域文化,同样,现代新儒学也拒绝移植西方文化既有“体系”,现代新儒学不必按部就班地按照西方学者所谓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体系来整合。不过,在方法论上现代新儒学倒是期望能够契合西方人创作的现代方式以增强其理论技巧。如当代儒学大师杜维明认为,儒学传统要想在现代得以延续,展开文化间的对话就是一种必须的选择,不过这个对话必须是在超越西方现代性层面上展开的,对话的对象不需预设任意限制,游刃于不同对话体内,谨慎吸取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现代新儒家寄希望勾勒出一种能够扬弃技术理性的价值理性为本位的、既有地域特色又与现代世界兼容的、“生生而和谐”的现代化文化蓝图。

现代新儒学在拓新发展中,不仅究其外部因素也注重内省,在一个倚重理性精神的现代世界里,如果单单倡导纯粹的德行精神,则势必会被现代社会排斥在“主流”之外。因而,现代新儒学需要给予认知主体一个合法的地位,即主体如何“显发”、知识何以“圆融”,这个环节很类似西方认识论中所阐述的合法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如康德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所作的论证。

现代新儒学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把持住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并依其本身之要求伸展其文化理想,“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sup>[8]</sup>。就如何在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氛围内确立科学精神的命题上,现代新儒家提出了一系列“内圣”而“外王”的理论构想,如熊十力的“性智开出量智”说、牟宗三的“理性的架构表现”说与“良知自我坎陷”说等等。在“仁心”或“良知”之下,本体融入现象之内,德性统摄知性,现代新儒学追求的“通哲学、道德、宗教以为一”之路的畅通方成为可能。

现代新儒家理论努力构成了文化现代化的一部

分,也使传统文化深入到现代性问题的核心。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境遇中遭遇窘境的现象并非孤立,西方人自启蒙时代以来创造出“新的”世界体系之时,难题也就随之而来,直至今日;由启蒙所发动与倡导的理性观念下,导致了全球化、消费主义、权威的消解以及知识的商品化等等(后)现代性问题。在黑格尔之后,一个体系统治的时代结束了,重建一个没有体系的形而上学体系(亦成为后形而上学)正在当下的西方世界进行着。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新儒家理论努力构成了后形而上学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西方中心主义弥漫的文化氛围下,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们也看到,现代新儒学已经以其特定的方式关涉到了人类文化形态发展的未来,在人类文化向前转进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新儒学所提供的

文化发展模式至少可以为未来的社会文化形态演变提供一种基本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 ]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1970.  
[ 2 ]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 M]. 胡亚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3 ] 高清海.欧洲哲学史纲新编[ 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 4 ] 萨特.存在与虚无[ M]. 陈宜良,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 5 ]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M]. 李黎,上官仪,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6 ]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 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  
[ 7 ]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  
[ 8 ]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等.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N]. 民主评论,1958-01-01(1).

Choice of confucianis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of modernity

SUN Xiao-xi<sup>1</sup>, LU Yang<sup>2</sup>

(1. Institute of Sci-Tec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 Shaanxi, China;  
2.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industry has made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of modernity, but the Confucianism regarded as the Chinese classic culture comes into dilemmas unprecedentedly. It is a modern duty for the Confucians to convert the traditional form into a modern form. The modern theory of Confucianism cannot be constructed until the modern theory finds a suitable solution to avoi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modernity under the cultural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ey words:** modernity; modern confucianism; post metaphysics; rational spirit